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新旧动能转换研究*

丁任重 朱敏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两次动能转换时期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重要变化，靠大量要素、资源投入“以数量换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亟需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于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厘清什么是新动能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明晰我国经济增长经历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阶段特征，明确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即协调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内源动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夯实要素基础；协同优化营商环境由“硬”向“软”转变，为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市场环境；建设以内需为主体、外需助力的需求体系，为新旧动能转换开拓市场空间。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 新动能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461(2025)05-020-1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15年召开的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①随后，“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动能的具体形态作出权威阐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 作者简介：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敏（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①《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国政府网，2015年10月15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10/15/content_2947497.htm。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16年3月17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①2017 年，山东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2018 年《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山东确立为全国首个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此后，又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颇丰，已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界定、转换原因、路径和结果进行研究。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洪银兴（2018）指出，培育新动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杨蕙馨和焦勇（2018）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微观层面的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表现为要素组合方式、利用效率和科学技术的组合，中观层面的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表现为区域、城乡和产业之间实现均衡增长的过程，宏观层面的新旧动能转换则表现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盛朝迅（2020）认为，新动能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是通过转换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用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任继球等（2025）对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内涵作出阐释，认为从产业层面来看，新旧动能转换是指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通过进一步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和产业发展生态，提高产业生产率和市场潜力，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王铭瑾和李永友（2022）认为，新旧动能转换主要包括科技支撑、创新驱动和资源支持三个方面。张文和张念明（2017）基于难易程度和时间跨度的角度，从器物层面、技术层面、产业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这五个层面来阐释新旧动能转换。还有学者对具体行业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研究，焦勇和公雪梅（2019）认为，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包含全要素生产率和制造业技术范式双重维度的内涵。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朱子云（2017）认为，由于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均减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缩减，并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原因所在。姚毓春等（2022）指出，当下我国的科技创新逐步转向自主创新驱动模式，在资源要素方面人才、知识和数据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征，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王铭瑾和李永友（2022）认为，长期的投资依赖、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和投资率的持续走高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风险，企业颠覆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意愿不强等现实性问题，迫使我国面临新一轮新旧动能转换。余泳泽（2015）认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在于受到资源的瓶颈约束、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动力模式难以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现实。任继球等（2025）认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再平衡与弱循环共存，新科技革命正加速迭代、全球减碳大势所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增速放缓等内外环境发展变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 月 2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20/content_5161614.htm。

化的必要举措。

关于如何进行新旧动能转换。朱子云（201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要着力提振企业的投资信心，以提高资本投入增长率。张良贵等（2024）认为，高级生产要素在要素禀赋结构中所占数量的比例越大，越会增强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释放经济增长动能。姚毓春和李冰（2023）指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在总体层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创新人才培育这个核心资源、在重点战略层面深入推进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在微观主体层面要坚持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和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共同发展。傅春和赵晓霞（2021）研究了“双循环”战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他们认为在短期内，“双循环”主要通过持续的房地产调控和进口替代路径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在中期，“双循环”则通过创新和扩大内需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长期内，“双循环”在更高视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持续释放我国新动能的成长空间。程道金等（2024）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他认为，数字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在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赋能新旧动能转换。焦勇等（2023）基于营商环境和数字经济环境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加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新旧动能转换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环境则通过加速产业结构变迁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徐诗航和徐晓风（2024）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效果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和对外贸易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焦勇和公雪梅（2019）认为，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促进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技术范式变迁的环境也有利于新旧动能的持续转换。此外，还有学者进一步对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研究。庞磊和胡宇宸（202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发现“引进来”和“走出去”二者联动能有效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结果。张良贵等（202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对总动能的影响从整体而言是稳定的。具体而言，产业结构结构高级化有助于实现经济动能转换，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旧动能转换。张良贵等（2024）指出，在政策扩张期，数字经济和资本要素融合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经济动能增长，而在政策收缩时期，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相融合有利于实现总动能增长。李福柱和田爽（2020）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的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上，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和沿海地区总体上表现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仍未完成转换过程，内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尚不明显；在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消费升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全国各地均已完成了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从整体上看，全国及各地区在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要明显滞后于需求侧。程道金等（2024）以山东省为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新旧动能转换的效果，结果表明，山东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动能的耦合协调程度正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特点，但是目前的总体耦合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数字经济对新旧动能转换的赋能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王铭瑾和李永友（2022）指出，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具有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动能增长比欠发达地区快，新旧动能转换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沿海地区之间的新动能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陶长琪和彭永樟（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表现为加速效应，在中部表现为收敛

效应，在西部表现为分化效应。

综上，已有研究多为实证研究，多侧重从不同视角分析其对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也有学者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特征和方向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以借鉴国际经验。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上多偏重于问题及对策研究等，对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界定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逻辑阐述较为缺乏。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及其与新旧动能的关系，首先必须把握新旧动能的内涵。本文首先厘清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并进一步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最后，在上述基础上，阐述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持续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

目前，学界对新旧动能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因此，厘清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和性质是更好理解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和前提。

（一）旧动能、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界定

“动能”一词源于物理学，表示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后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引申为“经济增长动能”。经济增长动能主要指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持续良性发展的各种内在动力的集合。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长动能主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和配置。从需求侧看，经济增长动能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此外，经济增长动能还包括制度层面保障和市场机制运行等，是一系列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各类因素的合集。

动能有新动能和旧动能之分。旧动能是指粗放型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中，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源。旧动能一个显著特征是依赖要素、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在产业方面，旧动能多以投资、中低端产品出口和房地产拉动。旧动能推动下的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双低双高”，即低效、低质量、高耗能、高污染。

新动能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能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的统称。新一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数字创意产业等新产业，诞生了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孕育出平台经济等诸多新模式。

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旧动能转换奠定了制度基础和保障。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既有的增长模式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制度层面的创新来稳步、有序引导新旧动能转换。其次，体制机制改革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打好政策“组合拳”，畅通要素在新动能领域流动，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我们党突出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迈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出既要“放得活”又要“管

得住”。制度层面的一系列改革，使我国的市场功能逐步完善，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逐渐得以释放，为新旧动能转换奠定了制度基础、开拓了环境空间。

从产业层面来看，新动能主要体现为服务业拉动作用增强，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从科技的发展、需求的长期变化看，产业结构会有自发演化的过程，有的产业会消失，新的产业也会出现，产业比例也会发生变动，而当新的技术革命出现时，产业结构会有较大幅度的优化与升级。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新一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创意产业等新产业，诞生了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是一味地淘汰旧产业。加强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融合应用，将有利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孕育出新模式。传统产业和新动能并非对立与割裂的关系。

从创新层面来看，科技创新是新动能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包括技术发明和成果扩散应用两部分内容。当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新旧动能转换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实现经济稳步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和发展，催生出新产业同时，也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此外，模式创新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为企业在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有助于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高经济运转效率，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本文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其本质是以高水平技术自立自强为根本，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通过技术跃迁、产业变革与制度变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产业层面动能重构和制度动能持续释放的综合性、长期性过程，最终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性、相对性与异质性

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历史性。新旧动能转换是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18世纪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技术向蒸汽技术的转变。19世纪电力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推动了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更新以及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从蒸汽技术向电气时代的跨越。20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当下，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变革加速兴起，正进一步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异质性。就不同国家而言，基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有差异，在制度、经济规模、发展历程等方面也有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新动能具有异质性。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新动能存在较大差异。就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省份而言，新旧动能转换也会不一致。以我国为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东部地区常先于中、西部地区。就产业层面而言，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应用也会存在进度差异，通常，制造业和服务业应用新技术先于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具有相对性。新旧动能转换的“新”与“旧”并非绝对的概念，具有相对性。考察新旧动能转换的具体内涵，需要联系具体区域、特定时期来看。就国家层面而言，不同国家地区的新旧动能转换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被淘汰的旧动能放到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新动能，在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当下的新动能在未来会成为旧动能。

三、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动能转换过程。黄泰岩（2014）曾对这两次动力转换过程进行了梳理，刘伟（2016）就两次动力转换过程中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做了讨论。第一次动能转换表现为制度型动能推动，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进入高速增长期。第二次动能转换是需求动能推动下的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部冲击，但仍实现了较高速增长。

（一）1978年至1997年：改革开放后制度变革推动下的高速增长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的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及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引进了大量外资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

1978年我国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3684.80亿元，人均GDP仅有385元/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论断，标志着我国正式进行改革开放。经历十几年的发展，至1997年，我国GDP达80225.00亿元，人均GDP达到6522元/人。这期间，我国GDP实现了年均17.6%的超高速增长。人均GDP在二十年间翻了十五番左右。^①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此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度变革，即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

具体而言，推动此阶段经济增长的制度型动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村经济发展动力。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标志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正式开始。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比1978年增长33.6%。^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与成熟，农村地区的经济改革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城市经济发展动力。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仍存在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在农村成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围绕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等方面开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80年代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放权让利”阶段，发展到90年代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三是经济特区的设立注入经济发展新动力。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首批经济特区设立。由于在税收、贸易、土地使用等方面享有政策优惠，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先进技术和

^① 本段所有引用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1978年和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增长率原始数据来自统计年鉴，结果为笔者计算。

^② 此处所用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

外资，在短期内，经济实现了超高速发展。深圳 GDP 从 1979 年的 1.97 亿元增至 1991 年的 236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超 50%。^①

（二）1997 年至 2012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需求推动下的变速增长期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遭到冲击，出现经济疲软，我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下行趋势。为有效应对这种局面，2000 年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随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释放了外需潜力，有效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需求侧，尤其是投资拉动。

2012 年我国的 GDP 由 1997 年的 80225.00 亿元增至 547510.60 亿元，人均 GDP 由 1997 年的 6522 元增至 40431 元，GDP 年均增速约为 13.19%，人均 GDP 翻了 5 番左右。^②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虽仍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受到外部因素冲击，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我国经济步入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一系列政策举措下的要素推动力，即在重大战略和一系列政策激励的背景下，我国基于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口红利等要素禀赋结构，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具体而言，推动此阶段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效释放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能。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积极引导资金、人才等要素向西部地区流动。在结合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教育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举措，西部大开发战略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缩小了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从全国来看，2000 年至 2005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五年间，我国 GDP 年均增速为 13.4%；2000 年至 201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十年间，我国 GDP 年均增速达 15.2%。从西部地区来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间，2000 年至 2005 年西部地区 GDP 年均增速达 15.0%，高于同期全国 GDP 年均增速（13.4%）。十年间，西部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达 17.3%，高于全国同期 GDP 年均增速（15.2%）。^③ 从西部大开发实施后的经济实践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

二是加入 WTO 为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扩容。加入 WTO 对我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对接、吸引外资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我国变速增长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入 WTO 优化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环境。我国在经济规则 and 标准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借鉴和学习国外管理经验和贸易规则，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更为公平的制度环境。其次，外资流入有效

^① 此处数据参见广东调查官方媒体统计微信：《那个春天以来的故事》，2018 年 12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g5MjAwMg==&mid=2651315468&idx=1&sn=a5509c0eec6d063fe801267。

^② 此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 1997 年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增长率原始数据来自统计年鉴，结果为笔者自行计算。

^③ 此处所有增长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年均增长为笔者自行计算。

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加入 WTO 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我国市场的信心，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2001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 496.70 亿美元，2012 年增长至 1132.94 亿美元。^①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引进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延伸了产业链条。最后，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随着贸易环境的改善，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基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口红利，在一揽子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先进的技术设备进口，也促进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相关数据来看，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01 年的 5098 亿美元跃至 2012 年的 38668 亿美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 7.5 倍左右的增长。^②

在我国经济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一方面，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在自然资源、人口红利等资源要素方面的独特优势，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高消耗、高投入的赶超型发展策略；另一方面，在制度政策层面实施西部大开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一揽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三）2012 年至今：新常态以来结构调整的新旧动能转换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要素结构发生转变。廉价劳动力红利的消失，使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方式难以持续，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能源消耗增加，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加。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阶段也基本结束。过去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禀赋和资金红利消失，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我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多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科技进步和知识、数据等新要素。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产业层面存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当下，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情况。一方面，不少传统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创新能力不强、附加值较低，传统产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细”的情况。传统产业领域的钢铁、煤炭、水泥等由于前期过度扩张，叠加国内外需求增速放缓，出现了产能过剩，造成部分产品库存积压，价格低迷，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其中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 80%。另一方面，在芯片、精密仪器、高端装备等高端制造业中，关键核心技术欠缺，供给能力不足，像半导体、高端医疗设备等仍需依赖进口。高端供给体系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偏低、产品质量欠佳、绿色供应链滞后等问题突出。

消费领域存在消费升级与优质供给滞后的矛盾。从消费结构看，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居民消费逐渐从“温饱型”消费转向“品质型”消费，在消费选择上对绿色食品、文化娱乐、智能家居等高端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消费供给端而言，我国消费品的供给仍普遍保持传统服装、家电等低附加值、同质化的商品，消费品供给呈现低端消费品供给过剩，而个性化、定制化的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情况。供给端未能及时跟上消费需求变化，导致“海淘热”“境外购”现象突出。此外，从消费形式看，线上消费的快速发展与供应链柔性生产能力不

^① 此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 2001 年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 此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 2001 年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足之间的矛盾制约消费体验提升。这种结构性错配导致消费潜力释放受限，造成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波动下降，最终导致消费需求外溢和国内供给过剩并存的局面。

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结构性矛盾。从区域发展不平衡来看，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创新要素密集与中西部资源型产业依赖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供给还不均衡。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二是部分区域产业同质化严重导致资源浪费。中西部有的地区为追求经济增长，盲目承接东部转移的传统产业，导致区域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一是劳动力的单向“虹吸”。农村劳动力外流，而城市低技能劳动力过剩、高技术人才短缺。二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公共服务等方面远优于农村，步入数字化时代，城乡在数字基础设施上也存在数字鸿沟。

新兴产业内部发展也存在结构性失衡。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但是，在政策激励和技术迭代的背景下，部分领域出现结构性失衡。首先，在技术层面表现为低端内卷化和高端“卡脖子”并存。多数企业扎堆布局技术门槛较低的环节，导致低端产能过剩，而新兴产业的关键材料、设备和工艺仍依赖进口。其次，在产业层面存在着区域重复建设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缺失并存的现象。地方缺乏整体设计和前瞻性考虑，盲目招商同类项目，造成区域间产业同质化和资源浪费。同时，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协调，部分环节存在“断链”问题，制约了整体竞争力提升。最后，在资本投入上存在短期投机和长期技术攻坚之间的矛盾。资本过度涌入短期投机赛道，而对于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长期技术攻坚领域却缺乏足够耐心。

四、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逻辑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重要战略，是由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所决定的，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处于动态变化中，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在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等矛盾错综交织。在内部环境方面，我国的内需市场有待进一步激活，内循环畅通尚有堵点，产业结构转型处在攻关期，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面临诸多挑战。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我国的经济实践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发展潜力大，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和兴起，在“稳”字当头的总基调下，平稳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是维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平稳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全面、理性地看待经济发展的“质”与“量”、“形”与“势”，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科学把握“稳”与“进”、“立”与“破”

的辩证关系，坚持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新旧动能转换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关系。旧动能的转换为培育新动能创造了条件，新动能的培育离不开旧动能的基础，同时，培育新动能也为旧动能的转换注入更强劲动力。

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是保证经济平稳增长。要避免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出现断档现象，保证经济增长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对旧动能的依赖，同时有序注入新动能，让新动能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平稳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要以新带旧，持续更新旧动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对维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转换旧动能并非粗暴地淘汰旧产业，而是运用新技术、注入新动能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新旧动能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传统产业的动能更新过程也蕴含着新动能，要不断挖掘传统产业动能更新的创新潜力。要大力推动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推动传统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实现传统产业链条向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要以进促稳，加快培育新动能。新动能的培育，要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提升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力，为培育新动能持续提供内生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谋划未来产业，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内生动力；二是要突破关键性、通用性技术的“卡脖子”限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以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高质量发展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稳步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端要注重品质提升，在供给端要改善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要重视产业、区域和城乡发展的协调，要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涵是一致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速新技术、新动能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让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同时，着眼未来，大力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动能，是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全面理性地看待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的辩证关系。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规律之一。经济发展中的“质”通常表现为结构、效益和安全性，经济发展中的“量”则多指规模、程度和速度；质变是飞跃性变化、根本性变化，量变的过程则是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经济发展要实现结构上的质变，离不开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持续积累，而“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引起质的提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中，新动能仍在加速培育阶段，但尚未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因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赋能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协调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之间的关系，稳步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主要特征的。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培育新动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创新是培育

新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之时，我们更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创新引领、科技赋能，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活力，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具体而言，要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低碳等科技前沿，攻克技术难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实施产业链升级等重大工程，推动绿能开发与高端制造、智能算力等融合创新、一体化发展，加快布局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算力等未来产业，加大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培育速度。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以来，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必然要求我们要在新征程上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不可能走老路、邪路，既不能好高骛远、又不能因循守旧，不能以社会两极分化为代价，不能以物质富裕而精神贫乏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自然为代价，不能以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为代价，而必须不断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走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开放共赢、成果共享之路，大力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唯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供高质量供给，才能充分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态势，满足好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进而又为经济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需求空间、注入持续的内生动力。

总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和改革发展的攻坚期，更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培育新动能，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五、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内外不确定性加剧。我们既要适应全球化的新变化，又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更要顺应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升级方向，瞄准新旧动能的重点方向，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一）协调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内源动力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

要，也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科技创新转化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增加高质量的技术供给是基础，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关键，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是路径。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体而言，一是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核心技术的高质量供给。在关键技术领域，要突破原来的技术依赖模式，在高水平开放合作中突出独立自主探索，不断强化自主研发地位，逐步改变关键性技术来源与供给方式，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技术的自主供给。在通用性技术领域，要不断强化数字技术的核心驱动力作用。推进数字产业化，可以催生出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推进产业数字化，加速产业的智改数转网联进程，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二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优化创新生态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起到保障性作用。创新生态的优化需要从制度、政策和环境等多方面综合施策。良好的创新生态能够持续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大众创新活力。可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建设科技孵化器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集聚创新人才和高科技企业。同时，通过发展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三是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提升国家创新效能的核心任务，要推动企业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企业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关键作用，企业的需求可以拉动技术创新突破。企业在规模扩大、具有系统集成能力后，可以壮大为重要科技创新力量。一方面，要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市场优势，充分利用企业在把握产业共性需求、集成创新要素协同发力等方面的优势，尤其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在前瞻性颠覆性前沿性技术的突破、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上的独特优势，不断强化和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重构产学研合作范式。产学研融通创新能够充分整合创新资源，能够兼顾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目标，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有先天优势。如主导企业向配套的小企业开放实验设施，开展技术帮扶。

四是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走向企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落脚点在于推动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加速推进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突破，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同时，推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同向发力，助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转化跨越。

（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夯实要素基础

教育、科技、人才是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教育、科技与人才强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巨大工程，在新时代，要强化战略统筹，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和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新旧动能转换夯实核心要素基础。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要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先导性和基础性上的支撑作用。要确保基础教育公平高质量发展，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和办学水平，为创新型人才培养

与高新科技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要建立以科技发展为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超前布局紧缺学科和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推进数字化教育，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离不开创新这个关键环节。构建以创新为核心的协同机制，实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三者间的有效贯通，构建起以原始创新提供源头活水、集成创新实现系统突破、开放创新拓展资源边界的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基础研究、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积极探索开放协同、灵活多样的科研组织形式，强化基础学科布局，推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交叉融合，形成原始理论突破的持续供给能力，推进从无到有的原始性创新。同时，发挥科技企业能精确把握市场需求的优势，推进高校和企业协同集成创新，打造开放化的创新生态。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数字化时代，人才早已成为引领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变革的关键因素，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要加快建设全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优化人才战略布局。人才建设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优化国内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完善海外人才引进的支持保障机制。同时，要注重人才培养与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相配套，加速推进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高校做好学科专业调整“加减法”。

（三）协同优化营商环境，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良好市场环境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软实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既是系统工程，也是长期工程。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需要从多维度采用务实管用的举措。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谋企业之所需，打造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感的营商沃土，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坚实支撑。

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从“硬”向“软”转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围绕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聚焦反映强烈的问题创新改革举措，为经营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服务效能和政务水平。政府的重点应放在培育耐心资本、优化创新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环节上，让企业敢闯、敢拼，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提高政府的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让企业经营、项目建设等更加顺畅。同时，进一步放开竞争准入门槛，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降低税费成本、用工成本，消除金融供给壁垒，降低融资成本，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二是要提高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着眼于机会公平和竞争公平，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公平的发展环境，推动法治建设更加规范透明，清理规范行政检查事项，规范各类经营主体合规经营。同时，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解决好民营企业在相关领域存在的典型问题，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生产要素成本、市场交易成本。

三是加强建设数字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政府建设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形成数字技术赋能、数据要素驱动、智能治理协同的新型营商环境体系。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增强数字营商环境的治理功能，加快建立数据治理体系等举措，搭建起基础设施支撑、数据流动畅通、服务响应精准、安全保障可靠的数字化治理闭环，实现营商环境从“线下

跑腿”向“云端治理”跃升。

（四）构建以内需为主体、外需助力的需求体系，为新旧动能转换开拓市场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内需即是应对短期挑战的重要选择，更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之举。全方位扩大内需，也是稳步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途径。

我国经济正处在加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扩大内需步入更多依靠扩大消费的阶段，消费也从小康型步入富裕型消费的阶段。构建以内需为主的需求体系，一是要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消费提质升级。要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扎实落实一揽子政策，精准聚焦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发挥消费的撬动效应，坚定不移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更好发挥内需拉动作用，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撑。二是要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用好以旧换新政策，稳步提升汽车、电子产品、家电等大宗消费。三是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大力培育文旅体健融合等新型消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同时，加快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力度，提高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资占比。四是将提升消费和民生工程相结合，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城市更新工程。同时，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拓宽农村消费市场的空间，进一步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五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思维，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支持内需机制，形成投资和消费互促的良性循环，为扩大内需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推动高水平开放，有助于为培育新动能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充分利用好内外资源要素，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一是要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推动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同国际规则更高水平对接，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制度新优势。二是要更好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下的开放。要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深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三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四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发挥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大对欠发达国家支持力度，以自身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开放，实现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程道金、郭校天、唐建丽，2024：《数字经济赋能新旧动能转换的障碍、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科技经济导刊》第6期。

傅春、赵晓霞，2021：《双循环发展战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路径研究——对十九届五中全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解读》，《理论探讨》第1期。

洪银兴，2018：《培育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经济科学》第3期。

焦勇、公雪梅, 2019 :《技术范式变迁视角下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兼论持续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失败的原因》,《云南社会科学》第 5 期。

焦勇、辛思潜、王高飞, 2023 :《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新旧动能转换?——基于营商环境和数字经济环境的机制分析》,《经济与管理评论》第 5 期。

李福柱、田爽, 2020 :《我国经济增长中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研究》,《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庞磊、胡宇宸, 2024 :《“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中国物价》第 12 期。

任继球、魏丽、刘振中、刘筱, 2025 :《“十五五”时期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发展环境、问题瓶颈与路径任务》,《经济学家》第 2 期。

盛朝迅, 2020 :《“十四五”时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思路与策略》,《改革》第 2 期。

陶长琪、彭永樟, 2018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7 期。

王铭瑾、李永友, 2022 :《高质量发展中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趋势特征与省际差异》,《经济学家》第 9 期。

徐诗航、徐晓风, 2020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理论和实证》,《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 12 期。

杨蕙馨、焦勇, 2018 :《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经济与管理研究》第 7 期。

姚毓春、李冰, 2022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逻辑、方向与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余泳泽, 2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空特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2 期。

张良贵、王兴帅、孙久文, 2024 :《制度质量视角下数字经济促进动能转换的机制效应检验——以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为例》,《软科学》第 4 期。

张文、张念明, 201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东岳论丛》第 12 期。

朱子云, 2017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政策选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3 期。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Growth Drivers into New Ones

DING Renzhong ZHU Min

Abstract : After undergoing two periods of kinetic energy transformati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marked b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relied heavily on the input of large quantities of factors and resources to “exchange quantity for growth,”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growth drivers into new ones. Accelerat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ing high-quality

growth, and build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what constitutes new growth drivers an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se transitions, and define the pathways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oordina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provide endogenous momentu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collaboratively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shifting from "hard" to "soft" factors to improve market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demand system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and supported by external demand to expand market spa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Growth Drivers into New On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Growth Drivers

【责任编辑：严若谷】